

## 我在研習營的心得

林秋雲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 (一)

研習營的最後一天，晚宴上，我和同組的小夥伴們喝了很多酒。坐在身邊的臺灣姑娘說，她第一次喝了這麼多酒，生平第一次她有了微醺的感覺。我看見她和老師碰杯的時候，將杯中的白酒一飲而盡。

夜半散場，各自回到住所，在賓館的大堂遇到其他小組的夥伴。平日裏不怎麼熟悉的，現在話卻多了起來。或許是因為要離別了吧，趁著不知道下次見面要挨到何時，趕緊表達對彼此的欽慕。

半夜酒醒，室友出去唱歌還沒有回來。聽說那天晚上還有人通宵，儘管第二天的凌晨五點，香港和臺灣的營員都要趕飛機。閉上眼睛，卻怎麼再也睡不著了。腦袋裏盤旋著的是小夥伴們在餐桌上的談笑風生，杯盞狼藉，以及往日上課和田野調查的畫面。輾轉反側，終於，在天將亮未亮時成眠。

如果要談參加研習營有什麼收穫的話，大概，我會把認識了很多有趣的小夥伴排在第一位。我有很深的臺灣情結，因為從小聽著海峽對岸的歌仔戲，看著海峽對岸的錄影帶長大，知道那個叫做“呆丸”的地方，有很多人跟我說著一樣的鄉音，有著同樣的信仰，甚至連姓氏和風俗，都是很像的。一直還沒有機會踏上這片土地，而以往參加的學術活動，也很少有機會能夠接觸到年輕的臺灣學人。

搭建兩岸學術交流平臺是研習營的宗旨之一，這也可以稱得上是她的特色了。很慶倖在這裏，不但可以和臺灣的小夥伴一起上課、討論，分享他們的研究心得，更重要的是有足夠多的時間進行“多方面全方位”地交流——話題從教育、就業，到日常的衣食住行。當得知臺灣同胞經常並且喜歡在“某寶”上網購，大贊“某寶”給他們的生活帶去諸多便利時，我們一起驚呼：原來在某種程度上，大陸與臺灣早已實現了統一。

後來，我們都互相留了聯繫方式。我想，即使日後仍居兩岸，無論再見何時，我們已經是朋友了。

## (二)

接下來想要談論的，是學習心得。

一直都覺得，書念得越多，自己的視野變得越來越狹隘，很多時候，已經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隔個題目如隔山。且不論中國史與世界史，明清史與先秦、秦漢史的隔閡，同樣都是治明清史，專注於社會文化者，對於經濟、政治、制度等話題，也很有可能“一問三不知”。我就是個例子。由於平時對自己興趣以外的研究關注較少，以至於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對於何為“本色錢鈔”，何為“折色銀兩”（田野文獻，《大明會典》，鈔關）的反應竟然是一頭霧水。

不過，這也正是參加研習營的初衷之一。跳脫出原來熟悉的領域，或許會有不期而遇的驚喜。事實上，的確如此。此次研習營在授課內容上，突破了歷史學科的侷限，兼有文學、考古、宗教、藝術等多重面相。許多新知是此前從未接觸過的，譬如山東大學的方輝教授關於“聚落考古與區域歷史”的講演，不但帶來了考古學動態的最前沿，也讓我對考古學產生了很大的改觀，誠如方教授提到的那樣，當今的考古學已經發生了由“物”到“人”的轉變，考古的意義不只在於“證史”“佐史”或者“重建古史”，而更在於“通過發現不同時代人類行為及其與特定區域內遺存之間的關係，來復原古代人們的經濟、社會、儀式等行為”，豐富對區域歷史的理解，反思所謂的“邊緣化地區”。

我是閩南人，從小看慣了遍地的村廟與佛寺以後，來到山東總覺得有些不適應。這裏的人給我的感覺，沒有南方人那樣信鬼神，崇風水，但卻也缺乏些信仰，保守而務實。儘管很早之前便知道享譽全國的曲阜三孔，但始終無法明瞭那樣恢宏的建築之於古代帝國，以及地方社會的意義。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黃進興先生的講演，算是部分解答了我的困惑，雖然我暫時還無法確定，三孔在曲阜與曲阜在老百姓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程度應該建立起什麼樣的關聯，但至少，我總算明白了，為什麼以前大小考試要拜拜的時候，奶奶從來不會帶我去孔廟，而是帶我去供奉文昌帝君的霞東書院。

齊魯大地不只有儒教。趙衛東、顏娟英、劉家峯與李孝悌老師的講座，讓我認識到了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不但有信仰，而且信仰所存在的多元性與複雜性。看過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但卻從來沒有想到其中的全真教會與山東關係密切，當然也想不到山東留存有比江南數量更為龐大的碑刻資料。佛教亦如是。從來只知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卻不知道在北朝時期，佛教成為當地人重要的精神寄託，當時發願造像的，不只是僧人、比丘等佛弟子，或者是富戶、商人，貧者、無力

之家造佛像供養的在在有之，所以出現“法義兄弟等二百人造像”，便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及至近代，隨着傳教士的到來，山東不僅出現了當時躋身一流的教會大學，也建立了從沿海到內地的佈道站，到民初甚至發展出“耶穌家庭”這樣特別的基督教團體。或許，有了這樣雜糅的信仰傳統，便不難理解為何在明清時期，山東會發展出羅教這樣的民間宗教，以及大刀會這樣的神祕組織。

齊魯文化也不是想象中的那般內向和封閉。或許如王德威教授所分析的山東籍作家的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那樣，現代性曾經以怪獸般的面目進入山東，帶給生活在傳統之中的人們以強烈的衝擊，現代性也並不總是進步的，美好的，有時候甚至是扭曲的、病態的，夾雜着醜惡。但這並不是說，山東一直以來就是保守的。歷史上的山東地區，似乎要比近代來得更為開放和包容，因為這裏不只有山地，還有溝通外界的海洋和河流。刑義田老師的“再論中原製造”，通過對山東青州的西辛戰國墓，章丘洛莊漢墓等諸侯王墓出土的工藝品裝飾母題的分析，揭示了中原地區在史上可能存在的與域外草原文化的交流。如果說，彼時的交流以及產生的影響可能只停留於貴族階層，那麼到了唐代，這種趨向則是更為民間的、深入的。正如陳尚勝老師在“唐代登州港與東亞貿易體系演變”一講中所揭示的那樣，公元九世紀，隨着東亞冊封體制的崩潰，東亞逐漸形成了不再是由政府主導的交易網絡，而在這種向“貿易圈”演進的過程中，山東半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天然的地緣優勢，部分還要得益於割據一方的節度使勢力。儘管登州港的位置在十世紀以來便讓位於明州港，聯通南北的運河卻給山東注入了活力。在黃河尚未改道，泥沙尚未淤積之前，運河給山東的部分地區帶來了財富，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的風尚和潮流，所以才會有《金瓶梅》中所描繪的紙金醉迷的城市生活，那繁華的景象，形容起來卻是一點也不輸給江南大都會的。當我們前往臨清，找尋到明代地圖上的鈔關、臨清閘、舍利塔、鰲頭磯、清真寺（地圖上的禮拜寺在修建河道時已經拆毀，現存的清真寺為地圖上未標明的小禮拜寺），聽到塔檐的鐘鈴在風中作響，真的彷彿有一種在運河上行船的錯覺。聊城的大小碼頭已經無法讓我遙想康熙與乾隆南巡的當年，但山陝會館的精緻，卻是讓我嘆為觀止。我總算明白了，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屢次維修山陝會館的碑刻，而第一次修建會館，籌集到的銀兩就有捌仟壹佰玖拾柒兩之多！

### （三）

研習營中最快樂的片段，還有每天晚上的討論。讀博以後，最經常的狀態，是一個人讀書，找資料，冥思苦想，下筆成文，自說自話。難得有這樣一個機會，可

以一群人坐下来，就同样的文本，围绕着一个共同的话题，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雖然我還曾經為此發愁，擔心無話可說，等到真正參與其中，才發現过程其实颇为享受。

首先，是討論會讓自己發現一些先前沒有想到的，或者是想到卻沒有沒有想明白的問題。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兩次。一次是討論《金瓶梅》第四十六回至四十九回中出現的大量套曲，鄭培凱老師認為唱曲之人皆為海鹽子弟，文本則反應了海鹽腔在晚明的流播。在後來的小組討論中，我對“海鹽子弟”的身份提出了異議，並主張文本中的這些套曲實際上存在雅俗之別。對於這一現象，我能想到的是當時“士大夫宴集多用海鹽戲”，作者安排西門慶聽雅樂，實際上是為了諷刺社會上這類群體的附庸風雅。同組中文系出身的小夥伴，則結合了《金瓶梅》多處用韻，行文典雅的特點，指出後世被劃入俗文學範疇的擬話本實際上是“雅俗交融”，讀者群中當不乏士大夫階層。另一次則是去曲阜考察三孔。張岱的《陶庵夢憶》中曾提到自己謁孔廟的經歷，其中有“買門者以入，宮牆上有樓隆出，匾曰‘梁山伯祝英臺讀書處’，駭異之”。起初讀到這段記錄時，我考慮到是顧頡剛先生對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好奇一直在南方流布的故事怎麼就突然跑到了山東，而且還出現在“聖域”。提出疑問後，緊接著才想到，黃進興老師曾引用張岱“買門者以入”的例子，來證明這裏是一個平時不可隨意出入的封閉性的神聖空間。而“梁山伯祝英臺讀書處”的出現，似乎改變了孔廟嚴肅的形象，在張岱的筆下，孔廟更像是一處被異化的旅遊景區。在綜合討論的環節中，這點發現引發了小小的討論，王鴻泰老師提醒我們注意文人文集中的遊孔詩文，從文人心態的角度重審孔廟的性質，李孝悌老師則認為應當核對張岱寫下這篇遊記的時間，常規狀態下孔廟不太可能出現此類“侵入聖域”的東西。

很難說這樣的討論對於自己目前正在進行的課題研究有何具體的幫助，但無論從事何種研究，最值得強調的不正是這種思考和思維碰撞所帶來的樂趣麼。便只是去傾聽別人的發言與提問，分析他們的思考邏輯，往往也能夠給自己以啟發。

研習營結束之後，我在鄒平的鄉下待了幾天，鄒平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梁漱溟進行鄉村建設運動試驗過的地方，也是如今濱州市最富有的縣城。然而，如同中國的許多地區一樣，鄉村依舊是發展過程中被遺忘的。在這個五十年與幾百年差別並不是很大的地方，文化的斷裂感沒有那麼強烈。

我也曾反思，山東不乏有“煙絲醉軟”的小江南意象，這裏也不乏有在清初詞壇

上影響力頗大的王士禎、王士禛、宋琬等人，曼素恩的《張門才女》，開篇就是山東濟寧，可為什麼一提到此地，不自覺想起的，依舊是義和團與“怪力亂神”。後來，我算是找到了一點原因，明清以來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山東的研究成果遠沒有華南、華北、江南的來得豐富。所幸，已經有人捷足先登，陸陸續續進行了諸如運河與區域社會變遷等課題的研究。在可預見的未來，齊魯文化的面貌想必會越來越清晰。